

·文献学苑·

# 元代秘书监藏书论略

陈矩弘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 元代秘书监是元朝中央政府掌管图书收藏的重要机构。文章论述了秘书监藏书的主要来源, 秘书监藏书的内容, 同时还探讨了秘书监对藏书的管理和利用。

**关键词:** 元代 秘书监 藏书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3-0118-04

## The Books Collection of Secretary House in Yuan Dynasty

Chen Juho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Secretary House was an import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books collection in Yuan dynas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in resources and content of books collection.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way the Secretary House managed and used the book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ecretary House; books collection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3-0118-04

元政府武力统一全国后, 为巩固统治, 稳固政权, 开始由武功转向文治。重视图书事业便是元代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元政权建立后, 先后设立了一批修书和藏书机构, 如编修所、经籍所、秘书监等, 负责编修和保管利用图书。秘书监是元代中央政府最主要的藏书机构, 无论就其收书的范围还是藏书的种类和数量, 都在全国首屈一指, 可称得上是元代的“皇家图书馆”。

元秘书监设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云:“元起朔漠, 未遑文事, 太宗八年, 始用耶律楚材言, 立经籍所于平阳, 编集经史。世祖至元四年, 徙置京师, 改名弘文院。九年置秘书监, 掌历代图籍, 并阴阳禁书。”<sup>[1]</sup>秘书监, 秩正三品, 设卿、太监、少监、监丞、典簿、令史、知印、奏差、译史、通事、典书、典史等。下属官员主要有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辨验书画直长等。秘书监的主要职能是“掌历代图籍, 并阴阳禁书”, 是掌管图书收藏的机构, 同时兼领天文历数的部分职务。

## 1 秘书监藏书的主要来源

### 1.1 来自原宋、金的官府藏书

元太宗五年(1233), 蒙古军队攻占金朝首都汴梁城(今河南开封市)。汴梁城的图书文物, 全部归入了元朝, 这是元帝国第一次接纳的大批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的图书。这批图书为元帝国以后实行“尊经崇儒”的政治、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 元丞相伯颜打败宋军后, 得“督府图籍府印”。<sup>[2]</sup>九月, 以玉昔帖木儿为御史大夫, 搜括江南诸郡书板和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图书。至元十三年(1276), 元军攻克临安(今杭州市)不久, 世祖忽必烈下诏:“秘书省图书, 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 宗正谱牒, 天文地理图册, 凡典故文字, 并户口版籍, 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 高尚儒、医、僧、道、卜筮, 通晓天文历数, 并山林隐逸名士, 仰所在有司, 具以名闻。”<sup>[3]</sup>这道诏书, 对于保护南宋都城临安的文化典籍完整地归入元朝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月, 伯颜派遣内侍王埜, 接受宫中图籍、文物、宝玩等物, 又命焦友

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sup>[4]</sup>三月,伯颜进入临安城,又命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及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sup>[5]</sup>十月,已改任两浙宣慰使的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sup>[6]</sup>这些得自南宋都城临安府的图书文物,全部由海道运到元大都。同时,伯颜还命童文炳收得宋史及各种注记5000余册,归之国史院。童文炳认为:“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sup>[7]</sup>

## 1.2 元政府从各地征集上来的图书

元政府为了丰富库藏,不断到各地收集各类图书。至元十三年(1276)十二月,圣旨命秘书监“教于大都万亿库内分拣出秘书监合收拾经籍图画等物,可用站车一十辆,搬运赴监收贮”。<sup>[8]</sup>

元朝中央政府部门广收地方图书,丰富了馆藏。如,湖南宪使卢摯收括江南诸郡四库善本书籍,起运回京,藏于兴文署。武宗十一年(1307),也曾派遣使臣到各地收集经书。顺帝至正二年(1343),因修撰宋、辽、金三史文献不足,又下诏求购遗书,收书的重点仍在江南。至正六年(1346),元政府规定,凡献书的都授以官职。当时,松江人庄肃(字恭叔,号蓼塘)家藏万卷,且多手抄书,内容丰富,“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野史、小说家言,所在皆有,并以私目分甲、乙凡10门。”<sup>[9]</sup>朝廷为修宋、辽、金三史,特差危素来庄肃家选购所藏书籍。元顺帝还委派司书官到东南地区搜求私藏图书,四五年间、就收得遗书30多万卷。

## 1.3 元代编刻的各类图书

太宗八年(1236)在燕京(今北京市)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设立经籍所。编修所和经籍所后合并为弘文院,专门负责整理、修纂儒家经典以及蒙古典制方面的书籍。此外,元中央政府还设立了广成局、兴文署、翰林院、艺文监、太医院、国子监、太史院印历局等一系列图书编纂和出版机构。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并专一印行“祖宗圣训”及其“国制”等书。兴文署初掌“雕印文书”,后又“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并召集良工刊刻经、子、史,以《资治通鉴》为起端。”<sup>[10]</sup>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并负责编制历书。艺文监“专以国语数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讎者,俾兼治之。”<sup>[11]</sup>艺文监下设艺林库、广成局。太医院负责医书的编纂。国子监为元代最高学府,是元代重要的教育出版机构,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元代官刻,首推国子监。”<sup>[12]</sup>太史院印历局主要掌管天文历数和历书印造事宜。除了中央机构编纂书籍外,元代还有各路儒学和书院刻书,其中尤以书院刻书的成就最为显著,元代书院刻印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子集类图书。此外,元代书坊和私人也刻印了不少书籍,叶

德辉认为:“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多。”<sup>[13]</sup>

## 1.4 西方汗国及外国邻邦进呈的图书

元朝疆域广阔,陆路、海路交通均很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中国的先进文化在向国外传播的同时,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四大汗国同元朝存有宗属关系,故与元中央人事往来至为频繁。至元八年(1271),元朝设立回回司天台官属,以著名星象学者札马鲁丁为提点。1273年,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合并为一台,归秘书监管理。当时北司天台(即回回司天台)申报该台收到一批“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总计:

经书四百四十二部;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兀忽烈的《四擎算法段数》十五部;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阿堪《诀断诸般灾福》一部;蓝木立《占卜法度》一部;麻塔合立《灾福正义》一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速瓦里可法乞必《星纂》四部;撒那的阿速忒《造浑仪香漏》八部;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提点官《家内诸般合使用文书》四十七部;亦乞昔儿《烧丹炉》八部;忒毕《医经》十三部;艾竭马答《论说有无源流》十部;帖里黑《总年号国名》三部;密阿《辨认风水》二部;福刺散《相书》一部;者瓦希刺《别认宝具》五部;黑牙里《造香漏并诸般机巧》二部;蛇艾立《诗》一部,兀刺速八个;密勒小浑天图;阿刺的杀密刺测太阳晷影一个;牙秃鲁小浑仪一个;拍儿可儿谭定方圆尺一个。

上列著作和仪器计:天文图、仪器4件,天文历学书籍7种96部,数学书籍4种47部,占星占卜书6种若干部,医经1种13部,炼丹、堪舆、哲学、史学、诗学、辨别珍宝的技术书各1种各若干部。由此可见,元代传入的阿拉伯图书可谓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

## 2 秘书监藏书的主要内容

秘书监藏书的内容丰富,收书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古代的各种历史记载,各种汉文及回回文(阿拉伯文)历书。古代各种记述地理沿革、水道、关隘、名胜、古迹、物产、民风等内容的地理书、地方志,及蒙古西征时从阿拉伯带回的大量回回地志。元朝列帝的著述、圣训,各种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以及各种法帖,字画,图像,碑志,释、道二教书,等等。可以说是网罗四部,不遗释、道。”<sup>[14]</sup>从元顺帝至正年间清理图书时留下的一本清册中,我们可以看出秘书监藏书种类非常丰富。该清册记载如下:

(1)在库书:经121部,1023册;史79部,1724册;集57部,1724册;道书303部,402册;医书14部,171册;方书8部,152册。

(2) 先次送库书 12 部, 478 册): 经 6 部, 113 册; 史 4 部, 75 册; 集 2 部, 290 册。

(3) 后次发下书 1154 部, 10634 册): 经 244 部, 2145 册; 史 132 部, 1843 册; 子 122 部, 712 册; 集 463 部, 5934 册; 法帖 42 部, 217 册。

(4) 续发下书 642 部, 7510 册): 经 166 部, 1946 册; 史 46 部, 1270 册; 子 26 部, 73 册; 集 120 部, 2053 册; 类书 96 部, 931 册; 小学书 68 部, 228 册; 志书 33 部, 330 册; 医书 51 部, 461 册; 阴阳书 15 部, 130 册; 农书 12 部, 37 册; 兵书 5 部, 21 册; 释道书 3 部, 22 册; 法帖 1 部, 10 册。

另外, 还有一大批收到而未入库的书画, 包括: 书画: 2008 轴; 法书: 482 轴; 法书: 83 轴; 手卷 399 卷 内府取 35 卷; 今在库 364 卷); 名画 1556 轴; 名画 1155 轴 内府取 83 轴; 今在库 1072 轴); 手卷 371 卷 内府取 30 卷; 今在库 237 卷); 看册 7 帙。

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二十二日, 张左承奏:“先奉圣旨, 教张平章俺两个分间江南起将来底文书去来。据经史子集、典故文字、阴阳禁书、书画宋神容, 俱系秘书监合行收掌。如别衙门遇有合检阅书籍, 立收附于秘书监关取, 用毕却行还监呵。”<sup>[15]</sup>从该文件可以看出, 元统治者从原南宋沦陷区域收集来的图书, 内容极其丰富, 并且其中的珍贵、精华部分都收藏在秘书监了。秘书监除了收集图书外, 还收藏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物, 如文房四宝、印章玉玺、碑刻画像等物, 可称得上是一座博物馆。

由以上可知, 秘书监藏书的范围非常广泛, 内容、品种也非常丰富, 裕庙书籍、裕庙砚、仁庙书籍、英庙御览、东宿官书籍、官司寇像、名臣像、子昂千文、卤簿图书、职贡图、大一统志、省库书籍、江南图书、江南秘省文字、内府图书之印、玉宝四颗、阴阳文书以及“图像碑志、方技术数之流”,<sup>[16]</sup>无所不包。正可谓“网罗四部、不遗释、道”。正如《秘书监志》的记载:“列圣之宸翰、纂述之纪志, 天下文籍、古今载记, 所以供万机之暇者, 靡不备具。”<sup>[17]</sup>由此可见秘书监收书之巨。

### 3 秘书监对图书的管理和利用

秘书监不仅重视图书的收藏, 而且很重视对图书的保管和利用。秘书监对图书的管理和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3.1 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加强对图书资料的管理

为了防止图书资料的虫蛀霉烂, 秘书监建立了定期暴晒制度。至元十五年(1278)秘书监规定:“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 须要依时正官监视, 子细点检暴晒, 不致虫伤 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兀都蛮一同检覈暴晒。”<sup>[18]</sup>

至元十六年(1279), 秘书监规定, 本监所收藏书画, 没有皇帝的圣旨或中书省的指示不能随便调阅。由于“秘书库所藏御览图籍、禁秘天文、历代法书名画, 谅为不轻。”<sup>[19]</sup>然而, “凡遇出纳, 秘书郎等自行开封,”<sup>[20]</sup>这种单人开封的做法不利于图书的安全保管。为了防止图书资料特别是珍贵的书籍图谱的丢失, 故延祐五年(1318)三月, 秘书监特规定:“今后移请监官一员, 不妨本职, 逐月轮流提调。……及出纳书画不测之事, 直目秘书郎等计会提调府亲诣府库, 用心监视, 一同开封, 毋致似前违错。”<sup>[21]</sup>这种监官轮流负责提调, 遇调阅重要书籍图画, 实行两人开封的制度, 有利于防止“不测之事”的发生, 对于图书资料的安全与保密具有重要意义。

#### 3.2 通过增设藏书工具, 传统裱糊等手段, 加强对典籍的保护

除了采取制度上的措施加强管理外, 秘书监还在技术上采取了不少措施, 以加强对图书资料的保护。至元十一年(1274)秘书监申奏:“多有收到文书, ……恐经夏润虫鼠损坏, 今拟用红油大竖柜六个, 内各置抽匣三层, 锁钥全。”<sup>[22]</sup>为了防止图书资料混乱丢失或发霉、虫蛀, 秘书监采用油漆防潮、防尘, 用锁钥防盗; 内置抽匣三层, 便于分类典藏。对于缺损的书籍图画, 秘书监采用裱糊的方法, 加以抢救保护。秘书监雇请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裱糊工匠进行裱糊工作, 如大德五年(1301), “差官前到杭州取发芝并匠人陆德祥等共五名, 驰驿前来秘书监裱糊书画勾当。”<sup>[23]</sup>

秘书监裱糊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就裱糊用料来讲, 仅面糊一项, 就极其复杂。不同的图书用不同的用料配方, 例如: 裱纸用黄腊、明胶、白矾、白芨、藜蓼、皂角、茅香、藿香调面糊, 而裱续绢只用黄腊、白矾、藜蓼、茅香调面糊, 所用调料相差一半。即使同一调料, 在调不同面糊时, 用量也不全相同。其裱糊技艺之精湛, 由此可见一斑。

#### 3.3 重视对图书的编目整理

秘书监在建立初期, “库无定所, 题目简秩, 宁无紊乱”,<sup>[24]</sup>在图书的编目和整理上较为混乱。图书编目上的“紊乱”, 不仅不利于图书的收藏保管, 也不利于图书资料的利用。至正二年(1342)五月, 秘书监丞王道深感整理编目之重要, 遂呈文曰:“古之书库, 亦各有目, 图书亦各看题, 所以谨贮藏而便披玩也。伏睹本监所藏, 俱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书名画, 不为少矣, 专以只备御览也。”<sup>[25]</sup>若不“随时分科, 品类成号, 倘时奉旨, 庶乎供奉有伦, 因得尽其职也。”<sup>[26]</sup>经批准, 王监丞组织秘书库人员, 把库藏图书“编类成号, 置簿缮写”。<sup>[27]</sup>从而使库藏图书资料都能做到有目可查, 方便管理和利用。

秘书监的典藏, 主要供皇帝阅览, 皇太子也可以借阅。至大四年二月, 皇太子命令秘书监把他看过的文书收贮回去, 共

交割书籍六百四十四部,计六千六百九十八册。内七部,纸褙计二百七十一册。省部衙门如有需要,经皇帝批准后,也可借阅。

由于秘书监有“掌历代图籍”之便,因此,元政府在确定编修大型地理书——《至元大一统志》时,就以秘书监为主要编修单位,并在秘书监内设立了著作局,聘用“鸿生硕士”任著作郎和著作佐郎,直接负责编纂事宜。《大元一统志》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sup>[28]</sup>实乃一部元代国史和大百科全书。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舆志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璠等所修《元大元一统志》最称繁博。”<sup>[29]</sup>要编出内容如此“繁博”之巨著,若没有丰富的图书典籍为依托,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反映出元代秘书监馆藏典籍的丰富,也表明元代重视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 [1]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一[A].丛书集成初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5:1.
- [2] 宋濂.元史:卷八,本纪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2.
- [3][4][5][6] 宋濂.元史:卷九,本纪第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179;179;180;185.

- [7] 宋濂.元史:卷一五六,列传第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72.
- [8][16][17][18][22][23][27][28] 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01;92;92;108;102;67;110;85.
- [9]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323.
- [10] 宋濂.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334.
- [11] 宋濂.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第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6:2223.
- [12][13] 叶德辉.书林清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76;87.
- [14]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845.
- [15][19][20][21][24][25][26] 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09.
- [29] 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5:596-597.

作者简介:陈矩弘(1973-),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献与出版。

(上接第114页)

### 3.3 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转让

修改权是指作者所享有的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作者享有的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许多国家没有规定“修改权”而只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了“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可见,在我国修改权是可以转让的。至于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职务作品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第17条规定委托作品可由合同约定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归属问题。而其他形式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否转让,著作权法并未明示。笔者主张,在网络时代,为了充分发挥网络快速传递信息的功能,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都可转让。因为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多媒体作品的创作都依赖于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转让。若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能转让,则任何著作财产权的购买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作品,将受制于仍然由原作者所享有的著作人身权。电子商务与多媒体作品的创作就会萎缩。另外,即使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可转让,转让著作财产权而仍由原作者保有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此时作者所保有的这两项权利

为“空洞的权利”。因为把财产权让与别人之后,这项财产就变成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了。<sup>[9]</sup>

参考文献:

- [1][2][8] 何炼红.著作人身权转让之合理性研究[J].法商研究,2001(3):48-53.
- [3] 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6.
- [4] 李琛.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4(2):72-74.
- [5] 张敏.质疑著作人身权的不可转让性[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43.
- [6] 秦珂.论互联网上的精神权利保护[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12):10.
- [7] 陈传夫.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134.
- [9]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36.

作者简介:谭九生(1973-),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管理学院讲师。